

技术时代的“人”与“文”

——陈祖芬《挑战与机会》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问题

何卓伦

内容提要 “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的范式转型，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当代文学研究的难题。而80年代总体社会图景在文学研究中的缺失，则是导致该问题的重要原因。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文集《挑战与机会》为我们提供了从该角度探讨文学转型的契机。区别于同时代作家对“纯文学”的想象与实践，陈祖芬试图直接面对城市改革的时代难题；同时，“改革”题材的难度也迫使作者自身的文学书写体制发生了变革，因此该文集较为典型地反映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路向在技术时代下的转型问题。借助社会—形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挑战与机会》的个案分析，可以描绘出这一类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转型轨迹与社会动力。

关键词 技术时代；报告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转型

关于“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范式转型，其发生条件、结构蕴涵与文学史意义一直是困扰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道难题。这个表征着“断裂”的文学事件，之所以到今天还是这么充满神秘，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将发生在文学内部的变革充分吸纳进历史的“元叙事”。由于转型之后的当代文学深陷于自己发明的起源神话之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文学转型的讨论要么是“纯文学”亦或“新启蒙”意识形态的自我重复，要么是对上述观念的知识谱系学分析和话语“解构”，都停留在“社会意识”的层面上，而缺乏对观念变革的非观念前提的必要考察。

80年代总体社会图景在文学研究中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体制改革自身的复杂性，尤其是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之后，把握时代的难度更是呈指数级增长，因为城市经济不仅规模比农村经济更为庞大，而且各部门的联系纵横交错，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文学则在此后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自

治性，因此，如果不仔细辨析，甚至很难找到其与时代相关联的蛛丝马迹。在这种情况下，重建文学阐释的总体性，需要我们在处理“大”的文学史现象之前，先找到一个“小”的切口，以便更直观地把握住文本与时代的有机关联。

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文集《挑战与机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区别于同时代作家对“纯文学”的想象与实践，陈祖芬试图迎难而上，直接面对和书写“新技术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改革，因而最先接触到时代大问题的核心内容。同时，由于题材的难度和挑战性，作者在把握时代的过程中也迫使报告文学自身的书写体制发生了转型。因此，该文本不仅关联着新时期文学中坚持“干预现实”的创作路向在技术时代下的转型问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学与时代互动机制的独特案例。通过该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技术”在此时构成了勾连二者的中介。一方面，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城市改革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普及加速了培养“理性经济

人”的社会合理化进程；另一方面，由“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所带来的“人性”的改变，又使得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想象日益与现实脱节，进而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改革”文学自身。而在这种以技术为中介、对时代与文学的双向阐释中，以《挑战与机会》为代表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在技术时代的转型轨迹，将最终把我们引向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转型的宏观图景的构想。

一 技术时代来临： 1984年的社会合理化进程

1984年，《十月》文学杂志和其他许多刊物一样，发表了一组“国庆35周年征文”。由于征文的性质，发表的文章大多紧跟改革主旋律，内容以反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主，《十月》“老作家”陈祖芬的报告文学作品《挑战与机会》即位列其中。与其他“征文”稍显不同，这篇文章随即成为一个全新的同名系列报告文学作品的开端，其中包括作者1985年发表在《十月》第3期的《全方位跃动》以及第6期的《经济和人》。次年，陈祖芬将这3篇作品及此时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类似文章，汇编成同名报告文学集，以“十月丛书”的名义出版。可以说，从单篇到文集，陈祖芬的文章刚好跨越了80年代文学从“前期”到“后期”的时间历程。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跟随潮流走上“纯文学”的道路，这既是由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性质，更与她个人的文学理想有关：以文学介入现实生活、“象鲁迅说的那样直面人生”^[1]是陈祖芬一直以来的写作初衷，而在当时报告文学中，似乎强调趣味性、情节性的“软性报告文学在升值”^[2]，这也进一步强化了陈祖芬的文学“使命感”：“报告文学如何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也许是报告文学作者如何把握时代、如何把握自己的一个重大课题。”^[3]因此，在《十月》期刊的鼓励下^[4]，陈祖芬试图迎难而上，正面书写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改革中“人的观念的变化”。

然而，时代的变化确实也给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结合文本中的相关内容，对陈祖芬试图把握的

“时代”有所了解。正如作者感受到的，自1984年起，“在每一个单位时间里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报纸的标题象叠影似地向你传递着新的信息”^[5]，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信息，莫过于作者在文章题记中引用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前，国际上正在出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6]这里涉及的“新技术革命”运动，正是引我们走进那个时代的关键入口。

1984年的中国，以微型计算机为代表的大量电子产品如潮水般涌来，不知不觉地进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场所。在商场，购买录音机的人群排成长队；在车间，工人配合着专家将数据录入计算机的管理系统；居民区的小孩围着一台电视机看精彩的武打片，而更多的年轻人则通过广播、电视等渠道恶补文化知识。人们在信息时代的快节奏中感到无所适从，却未必清楚，日常生活景观的上述变化其实是国家有意促成的局面。经过1983年、1984年的两次国务院对策讨论会，高层普遍认为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国要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以便迎头赶上。从此以后，中国的技术发展路线从传统的技术遮罩政策转向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外向型发展。与此相伴的则是技术知识和技术产品的大规模社会普及，而其中又以信息技术的普及为重^[7]。

然而，上述变化如果不仅仅是8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边角料，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新技术革命”中引进的“技术”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在《挑战与机会》一文中，计算机专家来到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协同安装计算机的管理系统，文中真实地记录了该公司财会人员面对这个新型机器时的抵触情绪：“一些财会人员的脸上明显地写着不安全感。他们近乎本能地要维护那六十几个他们用惯了的、而且世代代都这么用过来的大帐本，维护他们每天要经手的两千五百张左右的票据。”^[8]为什么本意在节省劳动、提高效率的微型计算机的引入，会引起劳动者的抵制呢？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引出两点：第一点，财会人员将计算机视为对自身劳动主体性的威胁，这从一个会计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你们把计

计算机搬来,我们就得扫厕所!”^[9]如果计算机不是帮助劳动者提高地位的工具,反而是劳动者的竞争对手,那么作者就在另一处议论中说出了第二点:“计算机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不会受刺激,不会神经错乱。”^[10]换句话说,也就是计算机比人更加“理性”,因为它排除了人的情感。作为参照,1984年至1985年间,《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多篇关于“工厂中进口计算机开机率不足,被弃置不用”的报导。针对这一现象,王洪喆通过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史的梳理,揭示出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的微型计算机,是如何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厂的劳动监控活动中,与工人既往的劳动方式发生冲突,进而受到工人群众的抵制^[11]。由此可见,陈祖芬观察到的对于技术革新的“这种被动的、近乎被迫的样儿”^[12],在当时绝非偶然。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技术”与“人”的矛盾,恰恰构成了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的动力。这种调整首先是从技术产品的“内在社会系统”开始的,《挑战与机会》中详细描述了首钢机房集体组装进口计算机的场景。在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压力下,计算机房的指挥所变成了“火药味很浓”的战场,为了节省时间,每个人说话都像计算机语言一样简洁,省去了“一切虚词、形容词、客套话、废话”,在这种情况下,“年龄、资历、级别、关系全部失效,无暇顾及。人人‘态度生硬’,人人互相理解。只是那些小司令们有时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指挥起‘头头’、前辈来了?”^[13]如果说火药炸毁了中世纪的骑士阶层,那么计算机在这里,则抹除了传统的“论资排辈”的等级秩序,而要求一种更为理性、不讲“人情”的管理风格。这个例子鲜明地揭示出作为人造物的技术产品并非完全被动的物质客体,相反,其内在的“理性”结构会向它的使用者提出要求^[14]。通过这样的方式,当引进的技术在国内的生产环境下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时,为了不让购买产品的巨额投资打水漂,其结果必然是让“人”适应“技术”,而非相反。

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启示,那就是从技术视角理解改革。事实上,将“新技术革命”推向高潮的1984年,同样也是中国体

制改革的历史转折点。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以农村为重点的局部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在与技术引进相伴随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技术思维带来的“合理化”观念^[15]是如何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合理化”首先表现在现代科层体制的建立之中。1984年是企业整顿深入进行的一年,具体来说,整顿的内容包括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健全财物会计制度;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以及有计划地全员培训;在企业管理中逐步采用现代化管理模式等方面^[16]。通过这些措施,严格的规章制度代替了群众动员,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合理化”还有与“科层制”相反相成的另外一个内涵,那就是培养市场环境下自负盈亏的“理性经济人”。厂长负责制的建立,以及从经济承包责任制到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其目的都是为了扭住“增强企业活力”这个城市改革的中心,“把企业与其职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之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17]。由于这种权责下放的“合理化”进程伴随着生产活动日益明显的分散化与个体化,生产主体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政策信息的捕捉,也就具有了与日俱增的重要性。首钢政策研究室的情形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太多报刊、杂志看不过来,领导者决定:“每人包干若干种,新来的杂志各人自己抓时间在三天之内浏览一遍,重要文章精读,在信息交流会上反馈。如果发现谁包干的书刊中有重要文章、重要信息没有及时反馈,那就扣分!”^[18]

由此就产生了1984年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改变,一方面,从领导到职工、从城市到乡村、从儿童到成人的全民学习风潮,让一批抽象的专业名词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专业化”导致生活领域的知识壁垒日渐增多,就连陈祖芬在这组文章的创作过程中,也不得不花相当长的时间阅读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另一方面,“在改革的时代,‘信息’二字好象一夜之间就成了畅销词汇”^[19],信息流通速度的加快连带着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兴奋、疲惫和紧张成为时代的普遍情绪。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

能理解作者为何感觉到“在每一个单位时间里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借助技术引进这个媒介,“合理化”从技术发展的某种“内在趋势”,延伸到相关制度设计和改革措施,再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灵结构……“技术”与“人”的矛盾,正逐步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改造。而当技术时代的“人性”发生改变,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学”也就遇到了挑战。陈祖芬的写作正是发生在这个变动的时代下。那么,面对一个快速步入科层制—市场社会的时代,陈祖芬的“现实主义”书写将遭遇怎样的困难?有哪些传统文学规范即将过时,又有哪些新现象需要文学的回应?陈祖芬坦言道自己是个“科盲”,而面对技术化的现实,她的抉择与反思,也将使文学进入一个质变的拐点之中:“可是,我怎么来写这篇文章呢?我们每个人全都面临着挑战和机会……”^[20]

二 解放还是物化: 技术时代下的人道主义

“有人说技术是有人性的”^[21],在《挑战与机会》中,陈祖芬就以“有人性的电话”作为第一小节的标题。之所以先从电话写起,是因为作者“对电话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手段有着最强烈的感性认识”^[22]。在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普遍影响下,一种将“文学”视为“人学”的观念使得以人物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写作一度成为主流。在这种写作规范中,“事物”只有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足够的意义,而这也是陈祖芬早期常用的手法。在新时期之初发表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中,作者借助人物的视角,从被红卫兵“扔掉的矿石标本里,看到了扔掉的一代代知识分子,一个个青年……”^[23]而此时,面对生活中经常遇见的电话亭,她的写作也遵从同样的思路。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作者对于电话的体验不仅不是“人性”的,就连那些等着打电话的人,脸上也都浮现着“程式化”的神情:“心急如焚,头上冒火。”“我拨着电话,占线,占线,占线……怎么哪个电话都占线?”^[24]作者将电话审美化的尝试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电话不仅

拒绝“人的感情”的进入,反而表现为一种外在于人的、遏制人的力量,人越是焦急地渴望将其“人化”,电话就越表现出坚如磐石、不可穿透的“物”的性质。个中原因,乃是由于它表现出了一种独立于人的“自律性”。作者就敏锐地将电话线看作一个国家的“生物的神经系统”^[25],也就是说,每一部电话的使用价值均受电话线路总数的支配,普及程度越高,社会需求量就越大。就这样,作为商品的电话也就受制于一个卢卡奇所谓的“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26]。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电话占线这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而这正是作者在书中面对电话最真实的体验:“我又在等,又深感着‘等’这个字派生的被动感、软弱感、无能为力感、听凭主宰感。”^[27]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性的电话”这个命题就不再能借由人物的“感性认识”来表现,而只能依靠说理的方式“推导”出来。于是,紧跟着打电话占线的场景,作者在下面就安排了整段的议论,她说:“一切技术进步的实质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28]而电话所节约的时间是无法估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性的电话”才得以成立。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电话的“人性”意味着时间。那么时间又意味着什么呢?——“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格言,换了一种句式,成为作者全书第一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金钱在贬值,时间在升值。”^[29]时间不再是人的生命之绵延,而是在与“金钱”建立交换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物”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样一来,审美的“灵韵”也就从时间中消逝。作者进入某地采访的过程中,文中罕见地出现了一段富于文学性的风景描写:“湖水绿得诱人。一排浅蓝的游船静静地靠在岸边,象一行待嫁而又无人问津的大姑娘。”然而,正当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在这里游泳多好”的感慨时,短暂的“出神”体验迅速被人打断:一位同志告诉她,领导正在开会,“没时间啊”^[30]。这段对话构成一个很有意味的情节,症候性地反映出“时间”对“人性”

的压抑。而这种表现在“时间”上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心理使然，或者用作者的话说：“越是有竞争心的人，越是处在时间的重压下。”^[31]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何为 80 年代后期的“现实”：摆在陈祖芬等“人道主义者”面前的，是更为符合原初语境的“物化”过程，而这和前文所述的“合理化”进程，其实是“技术”对“人”的改造的一体两面。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物化过程伴随着人道主义话语的盛行悖论性地演进，而后者对于前者竟表现出一种盲视甚至纵容的态度，这与其说是出于写作者本人的疏漏，毋宁说反倒标示出人道主义话语自身的限度^[32]。正因如此，面对日益复杂化、陌生化的现实，陈祖芬就难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全方位跃动》里，从兰敦华与日商洽谈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对“现实”进行误读的。扬州领带厂厂长兰敦华通过研究日本客户心理，成功地将领带出口到了日本，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由于领带供不应求，兰敦华趁势将价格抬高 15%，最后谈判结果是中方提价 10%，而日方增加 30% 的订货量。针对兰敦华提价的行为，作者感慨道：“兰敦华呵，你是不是太傲了？”^[33]紧接着，作者表示，中国人向来遇事谦让三分，但是过谦将使人畏缩不前，而必要的自信心、自豪感则使人勇于进取，最后发出呼吁“在需要开拓并且产生开拓型人才的今天，我相信我会听到很多骄傲的声音”^[34]。作者用一整节的篇幅描述“骄傲的积极作用”，而兰敦华的提价与其说是“骄傲”，毋宁说是市场“经济人”的理性逐利行为而已。这种将市场环境下的个体的“趋利避害”归结于某种独特个人“气质”的写法，正与前文将“电话”赋予“人性”一样，反映出“文学是人学”的传统观念是如何左右着陈祖芬对于“现实”的解读。

更严重的误读出现在陈祖芬对科层制下人性状况的描述中。在《论观念之变革》一文里，作者采访了某制药厂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老戴”。这是一个被时代“解放”的知识分子，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没有单位敢接收，直到 1977 年才被慧眼识珠的制药厂厂长挖去从事药

品研制工作。由于头两年“把容易搞的品种都拿下了”，现在“自然愈搞愈难”，供销科催着他，他就去催所里的人。此时的情形正与首钢计算机房里的如出一辙，他也开始变得“态度生硬”，也顾不了是否得罪人：“就是有误会，我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连想这种事的时间都没有！”^[35]

应该说，比起当一个囚犯，如今的“老戴”生活有保障，工作也稳定，这确实是一种更有“人味儿”的生活。然而问题在于，作者在故事结尾的议论中，将这种“人尽其才”的做法与“解放个性”可疑地划上了等号。事实上，如果说后者表征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那么前者则指涉体制改革中的现实举措——即在社会“合理化”进程中对于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这里，“才能”的本质与其说是人的个性，即独一无二性，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社会资源；与其说是人的某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不如说是从中异化出来的“社会职能”。可以说，为制药厂工作的老戴，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科层制恢复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标准的“职能人”。他最被人珍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自身的“人格”，而是来源于他在制药厂系统中的身份和功能。唯因如此，他才不得不在工作中压抑自己个人生活中非职能的部分，正如他所说：“一忙起来，个人的事就没那么多了。”^[36]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作者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念正与迅疾变化的现实日益脱节。作者越是要努力地唱出对“人性”的礼赞，她笔下的素材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物”的性质。从技术对“人性”的拒绝，到时间对人的宰制，最后连人的社会职能也同他的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正如工作场所中愈发普遍的“态度生硬”所暗示的那样，“人的性质和特点”在越来越“理性”的市场逻辑和科层体制面前“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37]。意识到观念与现实的裂隙，作者试图修正对“人情味”的定义：“人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现在真正为人着想，就应该劝人快，快，快！免得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无情地抛下来。”然而，就连作者自己也难以承受她所歌颂的“快”：“搞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快？不过人非机器，我临来前连连赶写文章，现在累得‘万念俱

灰’，只想睡觉了。是的，这次我非得先睡两天再工作。”^[38]

从“技术是有人性的”，到“人非机器”，人道主义的领地就这样越缩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挑战与机会》这部文集呈现出文学转型时刻的过渡性特征。在旧的人性论逐渐坍塌时，一些“新人”的轮廓已逐渐浮出水面——已经有人开始表现出“机器”的特征。比如计算机专家周小刚，当他的科研成果成功通过技术鉴定时，他却并没有表现得很高兴，“鉴定会上大家的评价他就好象没听见。他走出计算机中心去吃午饭的时候，感到自己象一台断掉电源的计算机，脑子完全麻木、空白了，马上最需要的是倒下来睡觉。”^[39]又如广东电信局副局长陈志康，工程师出身的他，头脑像他们局安装的两万六千门程控电话，“飞快地在传递、储存信息”。而他的讲话，则“如同电子计算机——以精确、快速见长。可惜我只能搞‘模糊数学’，我听着那一大堆数据，便好象面对两万六的程控机似的吓得茫无头绪。”^[40]

如果说这些描述似乎还只是在“机器”与“人”之间建立起外在的、文学化的隐喻关系。那么从作者对一场饭局的描写中，我们则可以发现一种作为控制论客体的人性景观。这场饭局围绕着西丽饭店请电信局副科长任登保办理电信一事展开，这种场合下，众人的“意识自由流动。不过他们的意识流好象受着一种电脑的控制——不管流到哪儿，总归又落到电信问题上。……每个人的‘意识流’都流向任登保。这些关于信息的信息，便在任登保这个‘终端’上显示出来了。他那大鼻子、厚嘴唇的纯厚的脸，只有在接收关于信息的信息的时候，才会象荧光屏似地闪亮起来”^[41]。在这里，意识流（自由）与电脑（控制）的关联，无意间道出了市场化时代下自律与他律的秘密：每个经营主体似乎都能通过等价交换自由地赚取财富，然而，他们各人的命运却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宰制。只有在技术时代的市场环境下，对一场本属平常的饭局才会出现如此新颖的理解。而这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想象人的方式，正如作者所说：“人生，也就是一个应战和挑战的循环往复的过程。”^[42]控制论思维的新颖之处正在于把客体归结为过程，一

个事物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输入—输出”模式的概率计算，来调控他的行为。无论是任登保接收信息和做出反馈（荧光屏的闪亮）的行为模式，还是作者对人生的“挑战—应战”式的理解，都是控制论影响下的“刺激—反映”人性论的鲜明例证。在这种模式下，人内在的一切精神气质（也即人的主观性的方面）均被当作不可知的“黑箱”而被悬置，而剩下的部分，作为可以调控的行为，作为受控的身体，也就与机器没有任何分别。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仅事物不再具有人的特性，就连人自身也只剩下作为物质存在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人物”在文学中的中心地位也就变得毫无必要。当现实主义的“文学”已不再是“人学”，那么“文学”自身的书写体制也就不得不发生改变。就这样，与现实的体制改革相呼应，陈祖芬的“文学改革”也正在同步发生。

三 当“人物”成为“信息”： 陈祖芬的“文学改革”

新时期以来，以徐迟那篇轰动文坛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报告文学开始进入一个小说化的时代，具体表现为“一人一事”的框架以及典型化的小说技巧。陈祖芬早期的创作习惯也是如此，在她的创作谈中，不仅认为作者应该“透视到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43]，而且还强调要“深入人物内心”，“爱上”自己的采访对象，“先动感情后动笔”^[44]。不难发现，这种报告文学小说化的现象背后，正反映出以“人”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支配地位。

然而，正如“寄情于物”的写法在电话面前遇挫，“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典型化叙述策略，则在一个购买录音机的场景之中遭遇瓶颈。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卖香港的录音机，抢购的人排起长队。作者认为这个象征着“春的信息”的场景必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于是她就想在排队的人群中“选两个人物来写一写”。显然，作者是希望抓住人群中的典型个体去反映整体，于是她先用语言模拟了一个特写镜头：“你瞧这个姑娘，那对不算大但是很有

神彩的眼睛里闪烁着会心的、幽默的微笑。”接着迅速切换到广角镜头：“这一屋子兴奋的、浮动的、摩肩擦踵的、噉噉喳喳的人，就好象是河流正在解冻、融化，它传来冰块的撞击声和春的信息。”^[45]这样的写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著名理论。

但是，单个的消费者之于消费者群体，并不像单个军人之于军队、单个革命者之于革命群众那样，在个体与总体之间具有稳固的有机联系。毋宁说，市场经济下以商品为纽带相遇的人们，他们之间的联系完全是偶然的——这就是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描写的人群：这个群体没有身份，没有面孔，他们聚集在一个小空间里，但人与人之间彼此毫不相关。这里既没有典型环境、也没有典型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锋文学的世界里，这样的人群如“杂草丛生一般”“像茅草一样遍地”^[46]。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从人群中挑出两个人来写之后，就再无法返回人群之中。接下来展开的仅仅是李晓云和周小刚个人的故事，他们和这一屋子“噉噉喳喳的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当故事进入到周小刚的篇章时，作者忍不住突兀地插入这样一段话：“也许有人要说：你这篇报告文学一会儿写事，一会儿写人，你到底是写人还是写事？关于报告文学的形式、格式，众说不一。其实，不要形成什么模式、程式才好。……与其花时间去争论报告文学应该怎样写，不如身体力行地去探索各种写法，去开辟各种途径，去面对‘报告文学怎么可以这样写’的挑战！”^[47]

“写事”与“写人”的分裂以至无法弥合的窘境，可以说标志着“典型化”叙述策略在“技术时代”的危机，也意味着徐迟式的“报告文学小说化”倾向就此走到尽头。作者在后记中指出，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从此我有了豁然开朗之感”^[48]，这或许就是针对报告文学写法变革而言。从此之后，作者由“采写一个人”转变为“采写一批人”^[49]，然而单凭作者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那么多人，于是，采访的目的也就从“深入人物的内心”变为增加报告文学“传递的信息量”^[50]。毫无疑问，这是社会层面的“合理化”侵入文学内部的征兆。

在此不得不提到美国未来学著作对作者行文风格的影响。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乍一翻开《挑战与机会》，仿佛不是报告文学集，而是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或是《第三次浪潮》之类的著作。”^[51]他提到的这两本书，正是以宣扬“新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建制派未来学名著。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通过各种渠道被介绍给政府工作人员，后经由国家领导人在正式讲话稿中引用，成为中国的准官方文献和“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导火索。两本书都先经“内部发行”而后公开出版，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第三次浪潮》，数年发行数百万册。这本书在方法上的特色在于，擅长用一个“系统的结构”，发掘出被掩埋在零散资料之下的大趋势。而对于陷入困境的报告文学来说，这样的“综合之作”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处理碎片化现实的新技巧。在《挑战与机会》全书中，作者不仅多次直接提到《第三次浪潮》及其作者托夫勒，而且就其写法来说，也很明显地带有托夫勒的影子：一方面是视觉化的、纪录片式的蒙太奇场景切换；另一方面则靠抽象的议论将这些零散镜头观念性地拼接在一起。

就前一方面来说，《挑战与机会》的场景描写表现出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卢卡奇曾比较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风格差异，认为前者从参与者的角度叙述情节，因而其作品带有“真正的叙事风格”；而后者则只从旁观者的角度描写场景，在作品中表现出静止的“绘画风格”^[52]。就此而言，在《挑战与机会》中，无论是用语言对电影镜头的模仿，还是用“这是……这是……”的句式将不同场景排比罗列的蒙太奇手法，甚至于对采访对象讲话的“实录”，都明显属于从旁观者视角出发的纪录片式描写。这种“纯客观”的场景描写固然由于作者没有时间充分消化过量信息带给她的体验，然而也的确让人联想到自然主义“使文学科学化”的特征。当然，如果说这样的写作与标准的自然主义文学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后者缺少一个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世界观，陈祖芬则恰恰相反——所有材料都是在一个抽象观念的指导下被裁剪和拼贴在一起的。对她而言，“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和一个企业的经理，同样地需要大量接收信息，迅速做出处

理。”^[53]在这种接收信息—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其笔下的材料已由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蜕变为完全失去质感的“经济信息”和“生命信息”^[54]。而作家处理材料的过程，也就变成一种“计算”，一种局部细节的机械相加。这样一来，卢卡奇意义上的文学总体性也就不再可能。

然而，在80年代后期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文学性的丧失在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那就是报告文学作为新闻报道的工具性、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实用性和参考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这个技术化的时代里，这样一门特殊文类似乎也变成了一种专门技术，用于撬动热点话题，引发国民讨论，也具有宣传和推动改革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不仅是陈祖芬所经历的改革道路，更在实际上代表了报告文学在文学转型期的大势所趋。同时代的批评家雷达，就曾经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报告文学具有“社会信息量很大，情感信息量甚弱”和“理性器官的庞大和感性血肉的匮乏”^[55]的特点。而据《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记载，在这一时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从当时极为流行的美国未来学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和约翰·奈斯比特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著作中，吸取了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到研究手段、统计方法等多方面的营养。”^[56]在内容上，他们大多围绕某一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深入思考，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文献价值和思辨性；在写作风格上，则普遍从单一视角转向全景视角，从写一人一事转向写人物群像和重大事件，因而也就“最充分地发挥了其新闻性与报告性的特性，成为最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文学样式。”^[57]可如此一来，文学价值的孱弱以及“传之不远”也就成为其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问题还没有到此结束。实际上，报告文学之走上彻底“实用”的过程，与纯文学之走上彻底“无用”的过程，是同一种历史境遇的两个方面。就在陈祖芬写作《挑战与机会》的同一年，一向有“作家中的思想家”之美誉的韩少功也敏锐地感知到了信息社会的来临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只不过，他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文学如何把握现实，而是文学在这个时代如何“自立”。因此，在《信

息社会与文学前景》中，他将文学的写实功能与宣传功能让给了影视与大众传媒，而着重强调文学“可以在培育人的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来发挥自己的所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大致方位的又一个座标点——‘感悟’型。”^[58]这种对信息时代文学之独特性的思索与追寻，到了年底的杭州会议，则发展为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在陈祖芬抛弃“典型”原则的同时，我们的纯文学作家也逐渐叛离现实主义的道路，只不过二者在面对时代的岔路口时，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技术时代，文学何为？”当算法时代的技术发展伴随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将我们带回这个问题时，回顾一下历史将不无益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通过一个跨越人文与科学的新型理论构架，在陈祖芬所经历的转变中发现了这样的故事：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城市体制改革，是如何以技术为媒介展开一个全面的社会合理化进程，而这样的合理化/物化过程又如何造成了现实主义书写体制的瓦解与“人”在文学中的边缘化。作为横跨20世纪80年代前期与后期的关键文本，《挑战与机会》典型地反映出非虚构文学是如何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文学特性，而与此相反的另一进程，即“纯文学”又是如何在保卫文学性的过程中失去了接触现实的能力，则有待另文再述。之所以先写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非虚构文学”，是因为这一条支脉的转向常常为文学史所忽略，而掩盖了非虚构的转向，“纯文学”的转型也就无法在一个总体性的辩证结构中得到理解。而决定这种辩证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能在文学史内部寻找，正如决定商品价值的原因并不能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寻找一样。由此便引申出一个关于“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我以为，“跨学科”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两个及以上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与之相反，“跨学科”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打通，意味着在不同领域的知识间搭建桥梁，以说明一个领域的范畴是如何在另一个领域中出现，并构成它的被人忽视的核心支撑点。对仍处于20世纪80年代“历史延长线”中的我们来说，这样的研究不仅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本

身就构成了对科层体制下学科壁垒的否思与超克。这是因为,只有借助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对体制自身的历史进行反思,才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起源。

[1][43] 陈祖芬:《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第279页,第2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5][6][8][9][10][12][13][18][19][20][21][22][24][25][27][28][29][30][31][33][34][35][36][38][39][40][41][42][45][47][48][49][53][54] 陈祖芬:《挑战与机会》,第336页,第338页,第10页,第9页,第23页,第23页,第24页,第23页,第33—34页,第30页,第12页,第11页,第13页,第12页,第12页,第13页,第161页,第12页,第9页,第14页,第167页,第60页,第61页,第77页,第77页,第71页,第22页,第173—174页,第171—172页,第132页,第15—16页,第18页,第337页,第111页,第12页,第111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 “《挑战与机会》——感谢《十月》给了我这样一个题材,这样一个启示,这样一个领域。从此我有了豁然开朗之感。”陈祖芬:《挑战与机会》,第337页。《十月》作为当代文学“四大名旦”中的“刀马旦”,也是1985年后为数不多的坚持现实主义方向的文学期刊之一。

[7] 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详细过程,参见杜磊《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1983—1988)》,《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11] 参见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14] 当然,这种“理性化”的过程绝非单向地由技术本身所决定。比如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就不可忽略“经济承包责任制”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15] 如果说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表现为以技术为代表的“目的理性活动”逐渐侵占社会制度框架的普遍进程,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我们则会发现,“合理化”进程的发生,实际上是由国家主导的市

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结果。

[16][17] 参见贺耀敏等《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第64页,第6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23] 陈祖芬:《中国牌知识分子》,《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73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6][3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第147页,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2] 同样,本文之所以征引卢卡奇等西方左翼人道主义的“技术物化论”,并非笔者毫无保留地赞同该理论的观点,而是意图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下人道主义话语的自我矛盾性。

[44] 参见《报告文学十家谈》附陈祖芬书简,见朱子南、秦兆基:《报告文学十家谈》,第109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6] 余华:《现实一种》,第45—4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0] “及至改革进入到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社会的一个一个横断面,是一个一个群体的形象。如果囿于一人一事的报告文学,传递的信息量太有限。”陈祖芬:《挑战与机会》,第112页。

[51] 张鸿生:《把握时代 讴歌改革——浅谈陈祖芬报告文学集〈挑战与机会〉》,《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

[52] 卢卡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5] 雷达:《谁把报告文学推上了前台?》,见《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赵学勇主编,第97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56][57]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第316页,第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8] 韩少功:《信息社会与文学前景》,《面对空阔而神秘的世界》,第74—7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罗雅琳